

社区情境与城乡弱智儿童教育模式的差异^{*}

——对北京市弱智儿童案例的分析

刘 丽 敏

Abstract: Despite an increase in the population of handicapped children and their families,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ir social living conditions. Based on the private conversations in the survey of Status of Handicapped Children in Beijing, this article shows different attitude and different education patterns of the handicapped childre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it points out it is the unique community environment and system environment that leads to the difference.

一、问题的提出

弱智儿童和他们的家人是一个弱势而又相对封闭的社会群体。这些家庭长年生活在困苦、焦虑与绝望之中,出于各种顾虑,他们不愿意被公开、也不会表达自己的期望与要求,因而他们始终没有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和支持。据统计,截止到1987年,中国0—18岁的弱智儿童已有660多万人,占同龄儿童总数的1.59%;仅在北京市,弱智人群的数量已达6.3万,占全市人口的4.5%,且这个群体还在扩大。因此,弱智儿童及其家人的生活状况已是一个亟待关注的社会问题。

在社会工作界,对于弱势群体的实际介入模式和关注价值理念一直存在着矛盾与争议。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国际上出现了特殊教育思潮和教育改革运动,其中以美国的全纳教育和英国的一体化教育为代表(佟月华,2002)。这种种教育的变革都是以整个社会看待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儿童的积极态度为基础的(甘昭良,2001)。在国际一体化教育的潮流影响下,我国也在80年代末提出了自己的一体化教育形式——“随班就读”。然而由于缺乏师资和各种客观条件的制约,加上没有一套完善的一体化教育理论的指导,这种“随班就读”模式难以得到健康发展,至今没有建立起完备的体系。事实上,普校教师拒绝接收差生、留级生并迫使其转入培智学校的事例屡见不鲜。另一方面,不少弱智儿童的家长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在正常孩子面前“丢人”而将其转入培智学校。在这些现象的背后反映出一种观念方面的问题:社会如何看待弱智儿童和他们的家人?家庭如何看待自己的弱智孩子和自身的处境?他们给弱智儿童贴上了什么样的标签?这对于弱智儿童的教育和成长又造成了什么样的实际效果?这一系列的态度与行为的产生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它背后反映了什么问题?本文希望通过对这些问题的阐释来分析与探讨我们应该如何关注弱智儿童及其家人的社会处境并达到一种最优化的关照模式。

^{*}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导师杨善华教授的悉心指导,在此谨表谢意。

二、文献综述

中国对于弱智儿童的关注和教育在近代史的研究中就可以看到,如郭为东在《基督新教与中国近代的特殊教育》一文中提到的澳门女塾、瞽叟通文馆和启喑学馆,它们分别开创了中国的盲、聋教育的先河(郭为东,2001)。虽然这些早期的教会特殊教育机构因涉嫌构成对中国教育主权的侵损而在收回教育权运动后由中国人自办,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讲,之后的中国特殊教育机构保留的只是原先西方特殊教育机构的形式,其教育思想中最为核心的正常化原则却由于国人对于基督教会的排斥而被废弃。

近年来,有关部门和学界较为重视对弱智儿童特殊教育方式方法的实验研究及其康复治疗作用的研究,因此亦有不少研究成果。如:郑子健等的《秦巴山区弱智儿童的社会文化成因及防治对策》(1999)、茅于燕的《弱智儿童在上课时和自由活动时的行为表现》(1994)、卿素兰等的《用心象加工训练弱智儿童记忆于思维品质的实验研究》(2001)、刘勇的《书法训练对弱智儿童注意力的康复作用》(1997)、张玉兰等的《弱智儿童三年特殊教育智商变化的初步探讨》(1999)。

然而,这样一些研究存在着两大缺陷。其一,过于注重对弱智儿童特殊教育教学方法的探讨,而忽视了支撑这套教学体系的教育思想。其实,我们在关心“怎么教育”的同时更应该反思其背后的价值关照、基本理念,这样,我们的特殊教育办学模式才可能有足够的理论依据做基础。其二,这些研究大都局限在把弱智儿童作为实验对象,考察他们在特定教学条件下的智力、记忆力、注意力、行为表现产生的变化,而没有涉及外部生存环境对于弱智儿童心智成长的影响。实际上,社会生存环境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弱智儿童的康复和能否享有正常的社会生活。

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和现代化进程的加速,社会结构变迁中出现的弱势群体及他们存在的问题越来越引起有关专家学者的关注。关于这些群体、这些问题的调查研究成为社会学、经济学研究的新焦点。许多学者带着深切的人文关怀,展开了全面深入的调研,并用事实向政府、向社会发出呼吁,帮助这些弱势群体尽快改善自己的生存地位。

弱势群体生存状况因触及很多体制因素、制度因素而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彻底的改善,但学者们的努力终究还是看到了成效,这部分弱势群体的生存问题已经成为上到中央、下到地方所有社会政策、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及各种媒体都在关注和宣传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一些社会组织、民间团体的介入使这些群体有规模地走出家门、走向社会,为自身增权。如果单纯地站在民间立场考虑这种社会行动的社会影响,至少这些群体使自己的“弱势”地位不再被“弱视”,相反地,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占到了“强势”地位,促使各级政府给予重视,并尽快拿出实际举措。

三、案例分析

实地调查中,笔者发现城乡社会对于弱智儿童的教育模式存在着较多显著的差异。为了对这种差异给予更清楚的分析 and 说明,本文意欲对城乡弱智儿童教育模式进行一种“理想型”^①的研究。本文所采用的个案资料来自作者于2001年10月参与的“北京市弱智儿童状况调查”。

处于北京市区和郊县的培智学校有着不同的教学氛围,教师和家长也风格迥异。市区的培智学

^① 所谓“理想型”研究,亦可认为是典型研究,即运用案例分析比较两类教育模式的“特征”性差异,并通过这种比较分析把握这两类模式的实质。

校教学设施要优于郊县。虽然市区的培智学校占地面积一般不大,但各种专项教育训练设施齐全,每个学校都有计算机房,美术、音乐、书法、烹饪、剪纸、交通法规演示教室,每个普通教室(即每日上基础课的固定地点)的墙上都有老师出的黑板报,教室里课桌整洁完好,有的还备有投影仪、电视、电脑、音响、沙发(如西城培智学校)。这些学校都按智力程度分班,每个班级大约有10个学生,班主任给每个学生都建立了详细的教学日记和家长联系手册。每天教师都会把孩子一天的表现、当天需要完成的作业和第二天需要带的学习用品或教学用具写在家长联系册上,家长则按照手册上的要求督促孩子完成作业,并及时与教师沟通孩子的在校生活情况。每天到了放学的时候,许多家长都会主动找老师了解孩子情况。而我们在郊县看到的情况就很不一样。学校的占地面积很大,但只有空旷的黄土操场和几十间没有现代化教学设施的教室,水泥地、土黑板、破旧的课桌,有的学校甚至至今还只能用风琴教音乐,更谈不上电脑教学。在这些学校的学生中还有盲、聋、哑和肢体残疾的孩子。学校将智力落后的学生按年龄分班,每班大约20人,由一个班主任负责,每个老师都要上好几门课。由于这些孩子大都住在离县城很远的村子里,因此他们必须住校,每周由家长接送。年龄大点的孩子则自己上学。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这里教师和学生之间、教师和学生家长之间的交往方式都要比市区随便得多,我们常常听到教师用“虎子”、“二宝”、“花儿”这样的称呼叫学生,即便是在课堂上。教师和家长之间就更没有太多的礼节,城里的教师常会受到学生家长毕恭毕敬的对待,而这里的教师并没有因为自己的职业而受到特别对待,教师和学生家长都默认的习俗规条仍是农村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长幼有序。我们在调查期间就看到过一位中年女教师给班上一个学生的父亲让座、点烟、倒水。那位家长也毫不客气,坐在那儿抽着烟兴致勃勃地跟站在一边的女教师唠家常,家长也不把教师当外人,那位父亲就曾对教师说:“没关系,当自己孩子,不对尽管骂,他犯混就打,没事儿。”

这种种差别最初只是调查者的一种感觉,但它确实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文化情境,而这种文化情境则影响着人们对人、对物的看法和一些基本的行为准则。它表明城乡家庭、学校对弱智儿童的看法、基本态度和对待方式、教育设计都存在很大差别。下面我们将通过一些具体的个案对此作进一步的讨论。^①

炜炜的故事

炜炜是个8岁的小男孩,长得机灵古怪,穿着十分干净,现就读于市区某培智学校。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吵着向老师要小红花,老师拗不过,只好给了他一朵,但告诉他以后不可以叫老师的名字。

访谈一开始,炜炜的妈妈就告诉我们孩子患的是自闭症引起的智力发育缓慢,据说怀孕时用脑过度很容易生出这样的孩子。炜炜的病是在3岁多时确诊的,炜炜妈妈在看杂志的时候突然发现孩子的行为和杂志上描述的自闭症症状一样,“他总是一个人不停地玩一种玩具,也不说话,我们马上带他去医院,检查出来孩子的自闭症指数很高”。

炜炜的父母都是理工科硕士,在国家某研究院工作,参加过国家“八五”至“十五”课题。发现炜炜得病以后,整个家庭生活的中心和重心都放在了炜炜的身上。为了能更好地照顾炜炜,家里请了一个保姆料理家务,炜炜妈妈则完全放弃了科研工作。炜炜的父母到处去听一些台湾、香港来的老师办的讲座,尽一切能力去教孩子一些基本的生活技能。炜炜妈妈是一位内心坚强的母亲,她说:“很多人说这种孩子根本没办法,一辈子都教不会,我不信,我们从来没有停止过教他。”

^① 本文所引用的个案资料均出自北京市弱智儿童康复协会“北京市弱智儿童状况”课题组的调查结果,经同意,在此使用。有关资料全文详见该项调查的个案访谈录。

炜炜在5岁半前上过幼儿园,但是很快就退园了,因为“幼儿园老师不会特别地关照教育炜炜”。后来,炜炜妈妈几经周折把他转到了现在的这所培智学校,她觉得“这种孩子需要的是一对一的教育,和正常孩子比起来,他的机会少很多,挫折感很强。听说这所学校有一个九五孤独症课题,就是需要多交点钱,我们也愿意把孩子送到这里来”。炜炜一家住在北京郊区,离学校很远,两年来炜炜的父母每天都要开车接送炜炜上下学。

为了让炜炜更多地接触社会、与人交流,炜炜的父母每个周末都要带他去公园或者出去玩,这其中经历了不少坎坷。“以前我们每次坐公共汽车到前门倒车都给他买饮料喝,他心里就记住了前门可以喝饮料。有一次逢上国庆交通管制,我们在和平门就得下车,他怎么都不行,后来就骗他说到前门了,可是下了车他一看不是前门就吵。他爸爸说,‘你是不是想喝饮料啊?他也不说,他不会表达自己的需要,后来给他喝了饮料他才不闹了。”“还有一次下大雪,我带他去医院,他坐车就要坐司机旁边的座位,但是我们中间要倒车,那个座位根本不可能空着,他就不上,我们一直等到天黑都没有位子。后来我硬把他拖上车,骗他说那个叔叔一会儿就下车了,他就一直站在那里问人家‘叔叔你什么时候下车’‘叔叔你什么时候下车’,结果人家不耐烦就走了。”

谈到炜炜的生活自理情况,炜炜妈妈兴奋地告诉我他穿衣服、吃饭、洗手都行,就连系鞋带也教会了。只是炜炜害怕一个人上厕所,炜炜妈妈就陪着他。

对于炜炜的将来,炜炜妈妈说,“我们不攒钱,根本不想将来,只是现在能多教他一点就多教一点。”

虎子 的故事

虎子今年17岁,是一家农户的小儿子,长的人高马大的,却不爱说话,见到我们就跑。

虎子的母亲是位典型的农村妇女,衣着朴素,待人热情。她今年51岁,头发已经花白,看上去很操劳。虎子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和一对双胞胎姐姐,都已成家。哥哥现在在北京开出租车,姐姐在家种地。家里现在承包了8亩地的果园,以此为生。

虎子13岁时遭遇车祸,大脑受损,阻碍了智力发育。但自发生事故送进医院抢救过来以后,便没有再就过诊,所以到现在,虎子的母亲对于孩子智力上到底存在什么病症也说不上来,只是觉得自己的孩子有时候比别的孩子反应慢一点,学习上不如别的孩子聪明,但其他方面没什么两样。用虎子母亲自己的话说:“我们家孩子可不傻,他淘气的时候坏着哩,我看人家也未必有他那么精怪。”

虎子平时在家爱看电视、睡懒觉,不愿意劳动。可虎子母亲不愿意惯他,“我就得把他叫起来,从床上打起来也要叫他下地干活帮忙去,咱种地的讲究的是勤快,他要是懒,以后就真的吃不上饭了。这孩子干活不比别人差,每年寒暑假,我都让他去帮乡下的姥姥、姥爷种地。”

说到虎子的将来,虎子母亲笑着说:“我们老了总是要走的,他要靠他哥哥也不合适,好在我们农村吃口饭还总容易,我们把地留给他,总能活命。等他再大点,毕了业,给他娶房媳妇,早点成家,我们也算安心了。”

比较炜炜和虎子这两则个案,联系我们在实际调查中观察到的一些现象,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些问题:

1. 对弱智孩子病情的认识。我们访问到的其他一些市区的家长对孩子的病情普遍都比较清楚,孩子的病多发现得较早,家长能准确说出孩子的病症和原因。炜炜妈妈在炜炜3岁时就发现了他的异常举动,并且马上得到了确诊。而郊县的家长对孩子的病情大多比较模糊,也不觉得孩子有多么不

正常,就像虎子母亲说的“我们孩子不傻,就是反应慢点”。

2. 对待方式。城里的家长由于很清楚地了解孩子的病情,因此比较特殊地看待自己的孩子,觉得他们应该受到特殊对待。炜炜妈妈就觉得“这种孩子需要的是一对一的教育,和正常孩子比起来,他的机会少很多,挫折感很强”。许多家长在知道孩子的病因后,都给予孩子特殊的保护和关爱。西城培智学校一位学生的母亲这样说,“我对这孩子挺愧疚的。因为怀孕的时候不吃东西,一吃就吐,所以造成孩子营养不良,脑发育受到影响,如果当时逼着自己吃下去,孩子可能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既然已经如此,我们总想多补偿他一点。平时在家,我什么都不用他做,到现在这么大了,衣服全是我洗。”而郊区农村的家长就不会这么想,他们觉得自己孩子“不傻”,更不会因觉得自己孩子需要受到特殊的对待而过分宠爱,加上农村的弱智儿童普遍不是独生子女,农活又重,家长并不会把所有精力放在只是“反应慢一些”的孩子身上,而是像普通正常孩子一样看待。这种对待方式上的差异可以从父母的口吻中体现出来。市区的家长在孩子提出无理要求或莫名其妙地出现异常行为时常常会采取连哄带骗的策略,并且设法揣测、满足孩子的需求;而郊县的家长少有这样做的,我们在办公室里就曾见到家长当场训斥孩子,让老师严加管教,甚至动手打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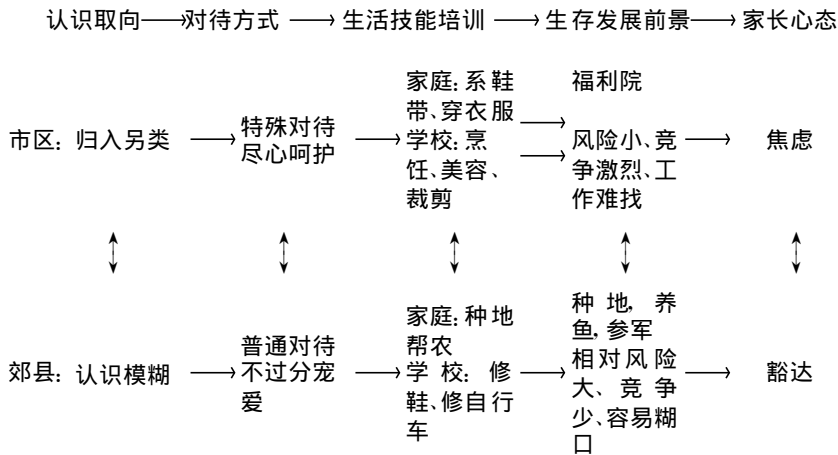
3. 生活技能培训。基于两种不同的对待方式,家长在日常生活中对孩子的要求也不一样,孩子的生活内容也不相同。城里的家长对孩子期望小、要求低,孩子会系鞋带、穿衣服,家长就很高兴了。而郊县农村的孩子平时在家或多或少都要去干活,虎子母亲“就是从床上打起来也要叫他下地干活帮忙去”,我们在访谈中也发现,农村的孩子基本都是这样。市区和郊县培智学校开设的职业培训课程内容也有明显不同。市区的学校多开设书法、烹饪、美容、剪纸、盲人按摩等课程,这些培训项目难度高、工作环境较好、劳动强度低。郊县的学校则不然,他们开设的职业训练课大多是修鞋、修自行车、钉钉子这样难度低、工作环境较差、劳动强度相对比较高的项目。郊县的老师说:“这些项目都要吃苦,不行就得打,逼着他学,城里的家长哪舍得呀!”

4. 生存发展前景。我们在市区访问到的家长对于孩子将来的就业普遍不抱希望,就像炜炜妈妈说的,“我们根本不想将来”。事实上,学校开设训练课程的职业在社会上的竞争也十分激烈,要想和正常人竞争同一份工作的成功机会很小。很多家长寄希望于福利工厂,海淀培智学校的一位家长就希望“能有与学校挂钩的福利工厂,让孩子能从事一些简单的劳动,比如糊纸盒啊、装包装袋啊等等,不要让孩子接触电,保证安全就行。我们并不在乎孩子能挣多少钱,靠我们夫妻俩的收入也能养活孩子了,但就是希望孩子能通过参加工作融入社会,被社会接纳,而不是呆在家里越待病情越严重”。然而,据了解,由政府开办的福利工厂现在普遍不景气。一些国家企、事业单位为了申报残疾人就业指标、争取到国家减免税优惠,不惜白出钱请残疾人入档但不安排其就业,这样一来,残疾人就业政策也只能是一纸空文。相反,郊县的孩子要解决生存问题在家长们看来容易的多,用虎子妈的话说,“吃口饭总还容易”。每个家长对孩子的将来都有所打算。在平谷访问到的几位家长就各有办法。比如“种地”、“养鱼”、“参军”等等。实际上,据有些教师反映,不少轻度智力落后的孩子从学校毕业后在县城里摆个修车摊儿、修鞋摊儿,“糊个口没问题”。

5. 家长心态。我们在市区的培智学校访问到的家长在谈话时语调低沉、情绪激动。上文提到的炜炜妈妈虽说是一位内心坚强的母亲,但在访谈过程中眼里一直含着眼泪,无法克制内心的焦虑与痛苦。这与我们在郊县农村看到的情况大不一样。那里的家长们个个都不太当回事儿,有时他们也担心自己的孩子,但与市区的家长相比,他们要豁达得多。

四、总结与讨论

至此,我们可以理清这样一条线索,如图所示:



城里的家长由于对孩子的病情和智力程度都非常了解,自觉不自觉地给孩子贴上了一张特殊的标签,将他们归入另类。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过于重视孩子的“需要”并试图尽一切可能去关爱和保护自己的孩子。他们对孩子谋生的要求较高,希望孩子能在一个工作环境比较安逸、劳动强度不太大并且没有什么风险的岗位工作。学校在与广大家长达到共识后相应地开设了诸如烹饪、美容等生存技能课。然而,面对城市巨大的生存压力和恶劣的就业环境,这些学生根本无法在社会上获得就业机会,最后他们往往只能待在家里领救济金。这种没有出路的处境给弱智儿童和他们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焦虑。

郊县的家庭对于孩子的病情比较模糊,这使他们忽略了孩子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而把自己的孩子当作普通孩子对待,不过分宠爱。学校教师和家长都会放心让智力落后的孩子去做一些体力劳动和学习一些比较切合实际的生存技能。这些学生的生活锻炼项目远远超出了城里智力落后儿童的系鞋带、穿衣服等简单生活自理内容,他们在家下地帮农,在学校苦练修鞋、修自行车技术,为自己习得了一套适于在农村社会中谋生的生存技能,易于在社会生活中获得正常的职业身份。

城乡社会对待弱智儿童为什么会有如此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和行为,这种差别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人们对弱智儿童的社会态度受到其所在社区情境^①的影响。在城市和农村,一个弱智儿童的存在给家庭带来的压力是完全不同的。虽然大多数城市家庭里的弱智儿童可以享受救济金等福利保障,家庭的生活压力也要比子女数多且收入不高的农村家庭小得多,但是城市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贫富差距的不断加大给城市中的居民尤其是那些经济地位、社会地位都比较低的群体造成了巨大的心理落差。弱智儿童的家长处在城市的社会情境中自然会比较看重孩子将来的生活条件,而通常家庭的收入水平并不能为孩子提供永久的良好的生活环境,这时家长的心理是非常痛苦的。而在对生活的要求向来不高的农村社会里,弱智儿童的家庭却没有这些焦虑。另一方面,社区中的舆论导向也有很大的作用。整个城市社会在向现代化、市场化迈进的同时其实忽

^① “社区情境”是对“社区情理”(杨善华、沈崇麟,2000)这一概念的借用和延伸。“社区情理”是指由地区亚文化决定的某些为在该社区中生活的多数人所认可的行为规范及与此相适应的观念。作者认为,社区情境也是指在某个特定环境下形成的文化、规范和情理,但其范围扩大或推广至整个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

略了那些被改革的浪潮沉溺下来的人群,加上城市社会对体力劳动的轻视,弱智儿童始终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并且蒙受着巨大的社会歧视。对这种歧视最敏感的反应者就是他们的家人。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孩子作为弱者保护起来,特殊对待。而这种歧视在农村社区则相对淡化,这就使弱智儿童在家庭和社区中有可能被当作正常人看待。

社区情境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制度环境的产物。在广义上,可把制度环境看成社区情境的一部分。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市区弱智儿童的受教育时间要早于、快于郊县的弱智儿童,但其生存就业前景却不如郊县农村的弱智儿童那么明朗。事实上,市区里这些智力落后的孩子在走出学校后真正能在福利工厂就业或被送去福利院的只是极少数,很多人被关在家里靠父母照顾或彻底隔离起来,靠微薄的福利资助度日,社会不向他们提供与人交往的机会和谋生的岗位。而在郊县特别是在农村,这样的孩子走出学校后仍生活在一个开放的社区里,除少数智力重度落后的孩子无法参加家庭或社会劳动之外,多数智力落后的孩子有自己的谋生出路并或多或少参与着社区里的社会生活,仍能受到家庭的保护和邻里的关照,有的甚至还能娶妻生子。城乡比较,为什么城里有更高的教育水准却没能更好地改善受教育对象的生存就业前景呢?显然,这其中有教育本身的原因,但也有(也许是更重要的)政策方面的因素,使社会无法向这些孩子提供正常的生存就业空间,换言之,社会还没有作好接纳这些孩子的准备。

城乡社会对待弱智儿童的态度和行为方式的差异所反映的问题与现今养老问题、妇女问题的城乡反差有很强的一致性。这留给我们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种差异并在其中寻求一种平衡?我认为,社会工作在这方面的努力有值得反思的地方。社会工作的核心——“助人自助”其实是对人的尊重为前提的,但在实际的介入过程中却无法避免不落入“越俎代庖”的过度保护的圈圈。在弱智儿童的问题上,如何秉承正常化原则,既让这些孩子有融入社会生活、享受社会权利的可能,同时又能有效地保障这部分人群的基本生存质量?这应是今后社会工作者和有关人士思考的重点。

参考文献:

- 甘昭良, 2001,《中国与英国一体化教育的比较研究》,《泉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第19卷第1期。
- 郭为东, 2001,《基督新教与中国近代的特殊教育》,《社会科学研究》第4期。
- 刘勇, 1997,《书法训练对弱智儿童注意力的康复作用》,北京大学心理系硕士论文。
- 茅于燕, 1994,《弱智儿童在上课时和自由活动时的行为表现》,《心理学报》第26卷第3期。
- 朴永馨, 1995,《特殊教育学》,福建教育出版社。
- 卿素兰、罗杰, 2001,《用心象加工训练弱智儿童记忆于思维品质的实验研究》,《贵州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19卷第1期。
- 佟月华, 2002,《美国全纳教育的发展进程》,《济南大学学报》第12卷第1期。
- 杨善华、沈崇麟, 2000,《城乡家庭——市场经济与非农化背景下的变迁》,浙江人民出版社。
- 张宁生, 1994,《为障碍者开启一扇门——特殊教育的“大陆经验”》,心理出版社。
- 张玉兰、巨秋梅、宋现, 1999,《弱智儿童三年特殊教育智商变化的初步探讨》,《河南预防医学杂志》第10卷第6期。
- 郑子健、曹蓉、张富昌, 1999,《秦巴山区弱智儿童的社会文化成因及防治对策》,《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第29卷第3期。

作者系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98 级本科生
责任编辑: 张志敏